

第十六章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叶季壮，年轻时因个子矮小，被拒入军门。参加革命后他却成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他在革命军队中长期做后勤工作，被誉为军队中的“红色管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第一任贸易部长。在反“禁运”中，创立同未建交国家开展政府间贸易的范例；出席万隆会议，访问非洲数国；同苏联斗争，外贸工作取得出色成绩。

一 改名兢天，在五邑闹翻了天

叶季壮，原名毓年，字耀周，曾用名郁年、兢天。1893年11月，出生在广东新兴县船区水湄村。母亲怀胎十月，生下自己的宝贝，却来不及听孩子的一声呼唤就离开了人世。尽管襁褓中失去母亲的婴儿还不知道痛苦，但没有母亲的哺育造成了严重的发育不良，所以，1912年叶季壮报考军校，因为个子矮，身体虚弱而没有被录取。谁知不久的将来，叶季壮却成了红军高级将领，革命军队中的“红色管家”。再过几十年，他又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贸易部部长，以矮小瘦弱的身体挑起全国的贸易重担。

叶季壮的父亲叶新国是一个善良忠厚的农民，终年劳作，但还是不能给家人带来幸福。穷则思变，一是自己借钱在附近开了一个小店铺，做点小本买卖，由于经营有方，家境逐渐好转；二是寄希望于自己的儿子。尽管家里不宽裕，他还是把7岁的儿子送进私塾读书。叶季壮也为父亲争气，发奋读书，成绩不错，深受老师的喜爱。

1912年，叶季壮已经是19岁的小伙子了。这时候正是辛亥革命后建立民国的时候，各地都兴起了从军热。他也报考了军校，但是由于身高体重不

合格未能录取，他只好改报广东公立政法学堂。被录取后，他便成为了政法学堂的学生。

1914年，叶季壮从政法学堂毕业。照道理，学政法的，一般会与政法打一辈子交道。但叶季壮除了在实习的时候当了半年法官外，以后似乎跟法律不沾边。毕业后的头10年，他主要是从事办学和办报两项工作。也许是受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的影响，叶季壮先后在江门、新会等地创办了两所小学、两所中学，又协助朋友在香港办了一所小学。他参加革命后，利用国共合作的时机，把新会县育才小学改为育才中学，还创办了一所育德女子小学，使女孩子能有上学的机会。他自己兼任这些学校的教师，向学生讲授政治课。

这段时间，叶季壮做的另一件事是办报纸。他受江门华侨子弟赵廷谦、赵廷耀的邀请，出任《四邑平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叶季壮改名为叶兢天。这是一份八版的日报，一天要登载一百多篇稿子。叶季壮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他既要采访、写稿，又要编辑排版，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因为才华出众，做工作一丝不苟、井井有条，深得同事的赞赏。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叶季壮在《四邑平报》上开辟“时评”专栏，刊载工农运动的消息。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把《四邑平报》改造成中共的喉舌，报馆也成为了中共的联络点。

大革命的洪流使得每一个人必须考虑自己在社会中的坐标。如果没有大革命的洪流，叶季壮可能成为著名的教育家或著名的办报人，但是，当大革命的风暴来临时，叶季壮像一只海燕，迎击风浪，在天空中翱翔。他在江门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省港大罢工，同年10月，又领导工人进行反苛捐杂税的斗争，把江门税捐局的牌子砸得粉碎，带人到县政府要求取消一切苛捐杂税。

这一切，既引起反动当局的仇恨，又引起了革命者的注意。反动政府下令悬赏缉拿他，反动分子密谋暗杀他，只是因为形势发展太快，敌人才没有得手。共产党也在斗争中发现了叶季壮。1925年12月，经陈经武、刘尔崧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任命他为巡视员。为了革命的需要，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部长杨匏安又介绍他加入国民党，同时委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巡视员之职。

既是共产党的巡视员，又是国民党巡视员的叶季壮，一方面秘密在广东各县建立中共党组织，同时又公开以国民党巡视员的身份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这时的广东是革命根据地，叶季壮如鱼得水，既把共产党的工作做得扎扎实实，建立了中共江门支部和新会支部，他自己担任中共江门支部书记。同时把国民党的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在江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

如同其他中共党员一样，叶季壮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上，而且很有一套办法。当时江门的工人组织分成两派，他们之间还有一些矛盾。叶季壮知道后，耐心地对双方做说服工作，消除了工会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工人内部的团结。

1926年下半年，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但是也潜伏着严重危机。这种潜伏的危机在1927年转化为现实的危机。4月15日，广东的反动派制造四一五事变。他们派人到《四邑平报》报馆来抓捕叶季壮，当时叶季壮正在楼上办公。

情况十分危急！

但是工人们在危急时刻保护了叶季壮。他们没有指认叶季壮。一个警察闯到二楼正好遇到叶季壮。因为不认识他，就问：“叶季壮在哪里？”叶季壮非常沉着，他朝楼上指了指，说：“叶季壮就在楼上办公。”军警们听说叶季壮在楼上，就蜂拥上楼。叶季壮在工人的掩护下跑出报馆，安全脱险，转移到江门农村从事革命活动。

就在4月15日这一天，叶季壮突然接到肇罗阳五邑警备司令兼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堂的邀请书，约他次日下午两点到司令部参加各界人士座谈会。

徐景堂是一个凶恶的军阀。叶季壮对此早已有所闻。而且在广东的反动派已经采取了行动，广东的形势急转直下。叶季壮在心里自己问自己徐景堂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越想疑问越多，他安排人到徐的司令部探听虚实。

原来，徐景堂设的是“鸿门宴”。

叶季壮知道事情的真相后，他没有慌张。他立即命令有关同志转入地下。安排好后，他才从容不迫地转移到农村。第二天，徐景堂在自己的司令部等叶季壮等人上钩。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当他派人去抓人时，已经是人去楼空。

中共八七会议后，中国共产党决定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中共广东省委准备举行广州暴动，要求各地积极配合和响应。为此，中共广东省委于1927年11月决定成立了中共五邑地方委员会，由叶季壮任地委书记。同时决定成立五邑暴动总指挥部，由叶季壮兼任总指挥。叶季壮到任就着手组织五邑革命军，并决定在12月13日在江门举行暴动。由于敌人有所觉察，加之与广州联系不上，叶季壮又下令取消暴动。

二 人民军队的“红色管家”

叶季壮在江门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后，逐渐暴露了身份。为了安全，党组织决定派他到其他地方工作。1928年，中共广东省委介绍他到上海中央工作，但因为联络中断而未能与党组织接上头。第二年3月，他只好折回香港，通过一番折腾才回到党组织的怀抱，并留在香港工作。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香港小日报》找到了一份工作，担任这家报纸的总经理兼编辑。由于报纸上刊登了内地工农运动的消息，宣传革命道理，引起了港英当局的注意，1929年9月，报纸被查封。

10月，叶季壮接到广东省委派他去广西百色开展武装斗争的调令，他愉快地踏上征途。从此，他与革命军队的后勤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广西，是大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之一，中国共产党在广西有一定的基础。大革命失败后，广西成为新桂系的地盘。1929年秋，粤桂军阀混战，蒋介石乘机派俞作柏、李明瑞出兵广西，打败新桂系，俞、李成为广西的统治者。中国共产党也非常重视广西的工作。1929年5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正在这个时候，叶季壮也奉命到了广西。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等领导发动了百色起义，成立了红七军，创建了右江根据地。叶季壮参加了起义，并被任命为红七军经理处处长，负责全军的后勤工作。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一句古训。叶季壮的体会就更深了。他认为，作战方针确定之后，后勤保障如何，对于战争的胜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如果把后勤工作置于不重要的位置，而忘记了军械、弹药、粮秣等军队的命脉，那么在作战中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深谙这一兵家要略的叶季壮，

从做后勤工作开始，就全身心地扑在革命军队的后勤建设上。

叶季壮作为红七军的经理处处长，向邓小平、张云逸等军部领导建议，改薪饷制为官兵一致的供给制，得到军部领导的批准后在部队实行，并建立了一整套财政制度和供给制度。后来，在党中央“左”倾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红七军奉命离开革命根据地，转战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等省，行程七千多里。在征战途中，叶季壮和经理处的同志们不辞辛劳，筹粮筹款，购置被服、医药及其他军需物资，保证部队行军作战的需要。

1931年夏，叶季壮随部队到达中央苏区。由于他在红七军后勤工作中的出色表现，中央调他到红军总司令部担任后勤工作，尽管他的工作有过几次小的变动，但基本都是在后勤战线担任领导工作，成为人民军队的“红色管家”。长期的实践，使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后勤工作的重要性。他主持建立了一套适合当时情况的供给制度，举办会计人员训练班并亲自讲课，为革命军队培养了一大批后勤工作人才。

当时，叶季壮面临的形势特别严峻。国民党军队在对中央根据地进行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的同时，还对根据地实行疯狂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在抗击敌人的军事进攻的同时，虽然努力生产，但还是满足不了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叶季壮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号召部队开展节约粮食、经费的活动，取得了好的效果。他花了很大的气力抓军工生产，在设备简陋、材料短缺的情况下，动员全体军工人员想办法克服困难，修造了大批武器和几千枚炸弹，从而保证了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长征初期武器弹药的供应。叶季壮的出色工作，得到当时的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好评，周恩来称赞这是红军军工生产有史以来“空前的成绩”。

如果说，在红色根据地做后勤工作，还有地方可做，因为根据地的人民是支持红军的。那么，红军开始长征后，后勤工作的难度就更大了，甚至可以说无处下手。长征出发时，叶季壮任红一方面军总供给部部长兼政委，担负全军的后勤供给任务。这个时候，红军流动性大，无后方作战，部队的消耗又特别大，因为战斗频繁残酷，伤病员又多，在这种情况下负责后勤供给，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了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叶季壮费尽心血。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组织供给部门的同志筹粮筹款，把没收来的国民党军官、官僚、地主豪绅的财产及战利品及时分给作战部队。红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他担任军需处处长，总供给部部长由林伯渠担任。职务上的变化，丝毫没有改变他对红军供给的责任心。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军委后勤部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八路军后勤部部长、陕甘宁边区物资局局长、贸易公司经理等重要职务，一直战斗在人民军队的后勤战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实行“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根据地，不仅停止了物质补充，而且还实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遇到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叶季壮作为后勤战线的领导人体会更深。当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后，他积极响应，组织部队开荒屯田，开发盐湖，兴办纺织等，为我军克服严重困难提供了物资保证。

叶季壮长期在后勤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把这些经验上升为理论，他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从1939年到1941年，他先后发表了《八路军的供给工作和供给制度》、《延安各军事机关部队查账运动的总结》、《论战时供给工作》、《八路军的后方勤务工作》，对革命军队的后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形成了符合革命军队特点的供给制度。在《论战时供给工作》一文中，他对战斗的准备工作、战斗时的供给工作、战斗结束时的善后工作，都有详尽的经验总结和评述。这是他对革命后勤工作的最大贡献之一。

医疗卫生工作是军队后勤工作的重要组织部分。叶季壮又是一个爱兵如子的人。他提出了“保障没有一个伤员遗弃于战场上”的口号。提出这样的口号容易，要变这个口号为现实谈何容易。这既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作基础，又要有相当高的思想觉悟作保证。为了创造物质条件，叶季壮通过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一批批物资和一些技术专家，开办了一所医科大学和一批卫生学校或训练班，为八路军、新四军培养了急需的医药人才，建立了一批医院。为了保证伤员的运送，他发动地方政府动员民众，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及时运送伤员。在提高思想觉悟方面，叶季壮教导全体医护人员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尽力救护伤员，把伤员当成自己的兄弟子女对待。正是因为这样，在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从来没有发生过遗弃伤员的情况。

这是一个奇迹。

这个奇迹与叶季壮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叶季壮所创造的这个奇迹受到党中央领导的高度评价，它成为我军士气高昂的重要原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之一。为了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共中央决定派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部队到东北开展工作。叶季壮和彭真、陈云、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如等六位同志作为先遣队先期到沈阳与苏军取得联系，为大批干部和部队进入东北地区创造条件。由于苏军实行了军衔制，为了方便工作，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决定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三位同志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段子俊、莫春如上校军衔。这是在革命军队中，由中共中央授予的第一批军衔。叶季壮身着中将军衔服，非常威武。这不能不让他想起当年他报考军校时的情景，那个时候完全是以貌取人，因为个子矮小而被拒之门外。现在他在人民军队中建功立业，为人民军队的后勤工作作出巨大贡献，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



1940年10月，朱德总司令参加了在延安王家坪召开的军工生产会议。自左至右：李涛、叶剑英、朱德、叶季壮、李强。

到东北后，叶季壮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后改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即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长、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东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商业部长等职，作为陈云的助手参与东北解放区的财政领导工作。

当时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美国支持蒋介石拼命争夺东北，并对人民大肆掠夺。苏军根据 1945 年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有部队驻扎在东北，东北苏军的后勤供给是就地取材。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受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有效地开展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开展财政工作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叶季壮在开展工作时，首先想到的是人民的利益。当时根据中苏有关协议，苏军在东北可以发行少量的军票作为筹集给养之用。但是，苏军违背协议大量发行军票，造成军票贬值，群众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为了稳定金融，叶季壮提出发行人民币来取代军票。通过这种办法，稳定了市场物价，维护了人民的利益。

三 第一任贸易部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叶季壮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贸易部部长。不久，又任外贸部部长，还先后任政务院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副主任，协助周恩来、陈云、李先念抓财政工作。这是叶季壮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幼年丧母的孤儿，曾经挣扎在死亡线上，受家乡有钱有势的地主豪绅任意欺凌的穷人，现在成为人民政府的部长，为人民掌管贸易大权，如果不用好权，怎么对得起含辛茹苦的父亲和养育自己的人民。

他要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的贸易和外贸事业。

他要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开创新中国贸易和外贸事业的新局面。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既企图用军事手段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地球上抹去，又企图用经济封锁的手段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他们对中国实行“禁运”政策。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叶季壮破“禁”有良方。

良方之一，就是利用矛盾，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铁板一块，一方面它们不能不听美国主子的使唤，对中国“禁

运”，另一方面，它们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需要同中国贸易。这个机会被叶季壮利用起来，成为破西方国家禁运的出路之一。

另一个良方，就是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往来。当时没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锡兰（后改为斯里兰卡）产橡胶，因出口不畅，价格下跌，眼看就要遭受严重损失，而且由于粮食歉收，粮价上涨，影响人民生活，甚至影响政权的稳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土地改革，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中国粮食丰收，但因各种原因国内急需橡胶。叶季壮从各方面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大胆地向政务院提出同锡兰开展以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得到周恩来的大力支持。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同锡兰进行了谈判，并签订了大米、橡胶换货五年贸易协定。这一举措，被称为创造了未建交国家之间开展贸易的范例，为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提供了经验。

1954年4月，叶季壮等陪同周恩来到万隆参加亚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的外交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叶季壮从周恩来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他在中国代表团中负责起草有关经济问题的决议。他在会内会外广泛地同亚非各国的代表接触，宣传加强相互经济合作的重要意义，探讨进一步扩大中国同亚非各国发展贸易的可能性，显得十分活跃。这次会议形成“万隆精神”，对当时，乃至对现在的国际关系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会后，叶季壮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了一些非洲国家，扩大了中国在非洲的影响。由于他坚定而又灵活地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和贸易政策，同许多国家签订了贸易协定。这对新生的中国是何等的重要。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叶季壮认真执行这一政策，积极发展同苏联的贸易。但是，苏联这位“老大哥”奉行的是“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斯大林去世后，他们趁人之危，在中国人民面临严重的天灾人祸时，苏联政府撤走专家，撕毁合同，逼中国偿还债务。叶季壮同全国人民一起顶住压力，同苏联方面作坚决的斗争，同时通过自己的努力，不仅还清了苏联的债务，而且还从其他国家进口了中国急需的各种物资，为克服困难作出了贡献。

四 李先念说：“叶季壮呈报的文件，是最可以放心的。”

做经济工作往往要同数字打交道，从经济数字中判断形势，作出决策。因此，叶季壮深深地认识到数字对党中央、国务院在制定政策时的重要性。他提出经济数字上决不能马虎。他说，搞经济工作数字很重要，数字反映事物的发展过程和性质，中央主持财政工作的领导，有时要依靠我们提供的数字来决定政策，采取措施，决不能马虎。因此，他听别人汇报时，一听到汇报的人使用“大概”、“可能”、“估计”等字眼时，他的眉头就锁得很紧，甚至会打断汇报人的话问：“这个数字到底是多少？”如果汇报的人回答不出来，准得挨批评。因此，凡是向叶季壮汇报或参加由他主持的会议的人，事先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就会“考试”不及格。

叶季壮是这样要求别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他给国务院的呈文，要反复核实，他批复的文件必须有根有据。正是这样的工作作风，赢得了中央领导同志的信任。周恩来在处理和决定关于财政方面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先要征求叶季壮的意见。长期主管经济工作的陈云和李先念，更视叶季壮为左膀右臂，信赖有加，陈云常常同叶季壮讨论问题至深夜。李先念则说：“叶季壮呈报的文件，是最可以放心的。”

在叶季壮看来，外贸工作必须解决好进口与出口的关系。他主张，以出定进，进出平衡，积极可靠，留有余地。进口用汇要保证重点，补助一般。在外汇使用上，主张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他对外汇平衡工作抓得很紧，隔几天就要找有关人员谈一次，如发生外币贬值或收支不平衡时，就天天抓，经常盘算怎样增加出口，怎样把人民用血汗换来的外汇用在刀刃上。叶季壮主持外贸部工作十多年，非常重视处理好内销与外销的关系。他的指导思想是，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下，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政策的需要，按照需要和可能，有计划地组织进口和出口。他强调，在制定外贸计划时，既要照顾人民当前的生活需要，又要照顾人民的长远利益。

对于增加出口，他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路。他认为，建立出口生产基地，是发展出口商品生产、组织出口货源的重要途径和发展方向，对于做好外贸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了增加出口，他向国

务院建议，对部分出口换汇率高的农产品实行奖售；对部分国内原料供应紧张的工业品，采取进口原料加工成品的方法，扩大出口；对出口矿产品给予必要的经济扶持。

这是叶季壮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

这些真知灼见对当时的外贸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有借鉴作用。

叶季壮提出过，做外贸工作“要摸着石头过河”。他的这一提法，同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时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摸着石头过河，叶季壮十分注意国际市场和世界经济的调查研究。在他心中时刻有一本世界经济账，也有一本中国经济发展的账。

叶季壮担任革命军队的“红管家”长达数十年，又担任新中国贸易部部长和外贸部部长十多年，按传统的观点“近水楼台先得月”，叶季壮一定捞到不少好处；按现在的世俗观点，叶家可以走上先富起来的道路。但是，叶季壮严格要求自己，他教育家人说：“近水楼台先得月，那是剥削阶级的格言。近水楼台不得月，才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格言。”

作为外贸部部长，外国朋友常送给他一些礼品，但他都如数上缴。他有许多出国的机会，但从不给家人或亲友购买进口货。按照规定，他出国访问，可以做两套料子服。回国后，他坚持要把做衣服的钱交给公家。有关方面的同志反复解释，叶季壮还是要交。这位同志只好说：“如果一定要交的话，就把衣服交给公家好了，反正你平时不爱穿料子衣服的。”

五 “我决不能做亏心事。”

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季壮受到了冲击。一些造反派认为，叶季壮担任十多年的贸易部长和外贸部长，家中不仅有很多财宝，而且还会有大量的“洋货”。他们组织一些人到叶季壮家去抄家。但是，结果令他们非常失望，在叶季壮家，既没有发现“洋货”，也没有发现其他财物。但是，他们还是不甘心，怀疑叶季壮把财物转移到了老家，派人到新兴县叶季壮的祖居进行搜查，尽管他们把死去多年的叶父的坟墓都挖开了，但还是没有捞到半根稻草。

让叶季壮更伤心的是他的一些老领导受到空前的冲击。

他曾经在邓小平领导下参加百色起义。在革命实践中，叶季壮认识了邓小平，对邓小平的雄才大略非常佩服。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侧重于党务工作，但同叶季壮还是有些接触。“文化大革命”发生后，邓小平作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第二号代表人物被打倒。但是，林彪他们也知道，他们要打倒邓小平的证据不足，因此，到处收集所谓的证据。为了这些证据，他们不惜使用法西斯手段。在他们看来，只要叶季壮能说出一点东西，就可以打倒邓小平。因此，他们三次派人找叶季壮“查证”邓小平的问题。

叶季壮也明白他的意见的分量。当来人询问他时，他缄口不言；当来人要他签字时，他顶着不办。他对自己的家人说：“我决不能做亏心事。”表明了一个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为真理而斗争的崇高品德。

叶季壮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写信给毛泽东，在信中谈自己的想法，吐为真理而战斗的心声。

他不仅为自己受到种种诬陷而忧愤，更为祖国的前途和命运而担忧。他期望为党工作更长的时间，但是，病魔悄悄地进入他的体内。

1965年1月，叶季壮第二次中风住进了医院。

他曾经在1961年第一次中风。那时，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党和人民的关怀，使他很快康复。在卧病期间，叶季壮也没有停止工作。在医院里，他向有关同志了解情况，交待任务，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但是，这一次住院已与前次不能同日而语了。国家开始动乱，叶季壮的心情更坏，病情终于恶化。1967年6月27日，叶季壮带着忧愤，告别了人世，享年74岁。

但是，林彪仍然不放过叶季壮。葬礼非常冷落，连个签到簿都没有。前来参加追悼会的周恩来等不满意这种做法。他对到会的同志讲起叶季壮在建军、后勤、外贸、外援等方面的贡献，流露出对这位老部下的深切怀念之情。

第十七章 粮食部部长章乃器

章乃器，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传奇人物，曾经与蒋介石作对，因擅长起草各类宣言，被称为“宣言专家”。他拒绝当国民党的官。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粮食部部长。他努力工作，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毛泽东称赞说，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

一 祖父赞曰：“吾有贤孙矣！”

浙江省有个青田县，以产石雕而出名，境内崇山峻岭，风光绮丽。章乃器就出生在这个县的小源村。出生时间是 1897 年 3 月 4 日。

章乃器的家庭既是书香门第，又是破落的官宦之家。说是书香门第，是因为章乃器的祖父是清朝同治九年的举人，父亲则留学日本；说是破落的官宦之家，是因为父亲在民国初年担任过青田县议会副议长，也出任过富阳、遂昌两个县的警察局长，后来不得志，一直赋闲在家，以至家道中落。

父亲给章乃器取名为章埏。等他长大后读到《老子》时，其中有一句话是：“陶人埏埴以为器”，他从中得到启发，于是便改名为章乃器。

章乃器有兄弟姊妹五人。大哥早年毕业于保定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成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后来同情中国共产党，为党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最后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大弟在大革命时期就是中共党员，参加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长期在国统区从事地下斗争，1941 年光荣牺牲。其他的弟妹都学有所成。

父亲非常重视章乃器的学习，从小就把他送到私塾发蒙读书。稍长之后，他被送到青田县立敬业小学学习。章乃器也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祖父也非常喜欢这个聪明的小孙子，经常出题目

考考他。在章乃器 10 岁时，章乃器看完《风波亭》后，受剧情的影响，非常痛恨秦桧卖国和陷害岳飞，钦佩岳飞精忠报国。他和几个小朋友一起，用稻草扎了一个秦桧像，然后用箭去射。祖父看见后，说：“箭射秦桧。”思维敏捷的章乃器马上对答：“笔赞岳飞。”祖父又说：“箭射秦桧奸贼。”章乃器随即答道：“笔赞岳飞忠臣。”祖父见孙子反应如此敏捷，又出了上联：“箭射秦桧，奸贼遗臭万年。”章乃器不假思索地说：“笔赞岳飞，忠臣流芳百世。”上联与下联十分对仗，祖父为有这样聪慧的孙子而高兴，发出内心地赞叹说：“吾有贤孙矣！”

章乃器 15 岁那年，一件偶发事件导致他投笔从戎。这一年是 1912 年。辛亥革命发生后，大哥在九江参加起义，随后考取了飞行营，不久又转到入伍生团。飞行营留下空缺。大哥做通了飞行营营长的工作，同意让章乃器到飞行营补缺。就这样，他就中止了学业，成为了飞行营的一名年轻学兵。

一年后，飞行营被取消，章乃器在杭州考取了省立甲种商业学校。他靠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18 年从商业学校毕业，经校长的引荐，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对于这个职业，章乃器并不满意，他后来回忆说：

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在当时这两种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

经过锻炼，章乃器恢复了健康。到 1919 年春，他辞去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的工作，到北京京兆银行工作。工作中他显示出很高的业务才能，受到老板的重视，一年后就升任襄理兼营业部主任。然而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局动荡不安，政界的头面人物像换走马灯一样快，由此也波及到银行。不到一年，章乃器失业了。当有人介绍他到中美实业公司去做买办时，生就一身傲骨的他在这个公司只做了三个月，就愤然辞职南下回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了一个薪水低得多的科员。不久他又因表现出色升任营业部主任。

二 练习生当上大学教授

也许章乃器在银行干下去，中国就会多一个银行家，少一个社会活动家。但是，局势的发展改变了章乃器的生活轨迹。1926年下半年，以两广为根据地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不到半年就占领南方大半个中国。在浙江章乃器家的世交夏超宣布浙江独立，章乃器的叔父和大哥参与其事，章乃器本人为夏超起草了“独立宣言”。然而夏超兵败被杀，章家受到株连。

1927年初，章乃器和大哥、二哥在上海会合。这时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二哥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北伐军顺利占领上海。章乃器为这种形势而高兴。但是随之不久，形势发生逆转，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蒋家王朝建立。章乃器是共产党的同情者和朋友，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他设法支持共产党。他的大弟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他知道的事。大革命失败后，大弟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多次把从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给章乃器通过银行换成钞票，充作党的活动经费。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的时候，中共地下党领导人杨贤江在武汉活动，经常有款项汇到在上海的同学郑文利。郑托章乃器经手存入浙江实业银行。有一次，杨汇来6000元巨款，国民党特务跟踪调查。章乃器得到消息后，迅速将汇款全部转移，结清账户。特务查到银行时，一无所获，党的活动经费安然无恙，地下党组织也避免了一次劫难。



章乃器在一次集会上讲话。

这一年的冬天，章乃器创办了《新评论》半月刊，这是他的第一次政治尝试。他的办刊宗旨是“要做潮流的指导者，不要做潮流的追逐者”。

这个宗旨反映了章乃器的人生价值观，也反映了他的独特性格。

章乃器反感蒋介石的倒行逆施。因此，在这个刊物上，他发表文章揭露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他自认为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而蒋介石的所作所为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章乃器对国民党的严厉批判，招来了国民党当局的记恨，1929年春，《新评论》被查封。

在办刊物之初，章乃器就说过，他并不想“在政治圈子里做投机勾当”。刊物被查封后，他又回到自己的老本行，经过奋斗，担任了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但是他没有满足，他期望在银行方面开创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1932年3月，他联合银行界其他人士，先成立了一个学术团体——中国兴信社。6月，建立了中国征信所，章乃器被推为董事长。这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信用调查机构。他领导的征信所积极开拓发展事业，使原有的四家外商信用调查机构先后倒闭，中国征信所则独步天下。

多年的银行实践为章乃器研究经济理论提供了条件。而善于思考的他又在经济理论研究上大有建树。从1933年到1936年，他著书立说，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不会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他的研究，但是他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银行家，他的经济学理论也有许多真知灼见。他批判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反对中国经济“国际化”，提出了“外国在华投资数字的增加，是战争爆发的寒暑表”的重要观点。他主张中国要有自己独立而统一的货币，反对加入英镑或美元集团，他是中国“废两改元”政策的积极倡导者之一。他的经济学理论通俗而深刻，他对金融有独到的见解，他说，“金”是一种坚硬而固定的物质，而“融”是融化流通的意思，“金”何以能“融”？这有赖于“信用之火”的燃烧，但有时“信用之火”烧得猛烈了，融化的金沸腾洋溢，反而要浇灭“信用之火”；接着，融化的金也就冷却而冻结了。这就是信用过度膨胀成了恐慌底现象——就是所谓资产的冻结。

章乃器的经济学理论在国内产生重要影响。1935年秋，只有中专文化水平，因出身练习生而感到自卑的章乃器登上大雅之堂，被上海光华大学和沪江大学聘为教授，讲授“国际金融”和“中国财政”等课程。他上课时深